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主编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ZHONGGUO SHEHUISHI JINGDIAN JINGDU

主 编 常建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 常建华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04-038424-6

I. ①中… II. ①常… III. ①社会发展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3850 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校对 孟 玲

责任编辑 梁宝贵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赵 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大厂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2.25
字 数 74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424-00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旨》，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就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就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续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的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有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吞舟是漏、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前 言

011 / 傅衣凌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027 / 张政烺与《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

074 / 林甘泉与《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

103 / 瞿同祖与《汉代社会结构》

134 / 何兹全与《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167 / 唐长孺与《南朝寒人的兴起》

198 / 周一良与《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
唐代婚丧礼俗》

- 217 / 伊沛霞与《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
博陵崔氏个案研究》
- 262 / 王曾瑜与《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略论》
- 278 / 陶晋生与《北宋士族妇女的教育》
- 296 / 陈高华与《论元代的称谓习俗》
- 314 / 萧启庆与《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
- 348 / 何炳棣与《明清社会史论》
- 384 / 喻松青与《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女性》
- 401 / 吴晗与《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 412 / 刘志琴与《晚明城市风尚初探》
- 431 / 森正夫与《〈寇变纪〉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
福建省宁化县的地域社会》
- 457 / 施坚雅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 493 / 经君健与《试论清代等级制度》
- 524 / 郭松义与《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

552 / 冯尔康与《十八、十九世纪之际的宗族社会状态：
以嘉庆朝刑科题本资料为范围》

583 / 张仲礼与《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
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611 / 蔡少卿与《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628 / 王庆成与《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

659 / 索 引

663 / 出版说明

前 言

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诞生于20世纪初，至今已经百余年，其学术演变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20世纪前50年，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30年，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海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不与中国同步，但是在这些阶段也有较大的变化。在此，笔者以时间为序探讨不同时期人们对社会史及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认识；以介绍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为主，兼及介绍海外的研究状况；最后谈谈本书的编选问题。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是梁启超的《新史学》。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翌年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认为：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现象，求其公理公例，指出社会科学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梁启超提倡历史学要研究国家、群体的进化，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这些认识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梁氏

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振聋发聩的看法，是受到海外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而且其提倡新史学甚至还早于欧美。1911年美国学者鲁滨逊也出版了名为《新史学》的著作，批评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他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并且将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进展方面；历史研究应该融会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用综合的观点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逐渐发展的过程等。梁启超的“新史学”比鲁滨逊早了大约10年。也就是说，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现代新史学观念比起西方并不落下风。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翌年又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运用唯物史论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奠基。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学，视历史为社会发展史，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深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1928年中共六大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托派则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1927年《新生命》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著文，认为战国以来中国自古就是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这场论战为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史提供了契机。社会史大论战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什么是“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的断限和特征，什么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概言之，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探讨，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这场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性

著作，探讨了商周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研究的新局面。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前书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专书，后书首次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制，秦以后发展为专制主义封建制，该说影响久远。40年代留学法国回国的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文明路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

社会史论战基本上属于以论代史的政论之争。陶希圣于1934年12月创办《食货》杂志，如副题“中国社会史专攻”所示，是社会史专刊，希望推动学者搜集社会史料，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食货》因此停刊，其存在两年半发行的61期，发表了340篇论文，探讨社会经济问题。陶希圣、鞠清远、杨中一、何兹全、武仙卿、全汉升借助《食货》探讨了许多新问题，培养了不少学者，该刊在中国社会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社会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重点探讨“五朵金花”，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沿袭社会史大论战，以解决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二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为通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解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印证中国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代及其定义、出现的经济部门、发展的程度及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发展缓慢的原因等。

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如先秦社会性质的认识离不开讨论血缘组织，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李学勤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历史分期问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1991）系统地提出了魏晋封建说。再如农民战争史，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民运动的状况，农民战争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推动了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在这方面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具有开创

性。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一批实证性成果。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关键点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和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关系。如认为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既是东方的特征之一,也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缓的重要原因。八九十年代问世而实际是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研究的几部著作,如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一—弹—弹》(1988)、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1989)、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1992)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1979)提出的很多问题也具有启发性。

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治史的潮流中,也有部分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充分占有史料并独立思考,从事创造性的社会史研究,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1955、1959)等就是代表。

欧美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思想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对于社会史有广义、狭义的理解,狭义的社会史以社会群体为主,在历史整体中理解社会群体;广义的社会史更重视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各系统之间的联系。总体的社会史是重视解释一般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史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主流,社会史也往往与政治史、军事史结合在一起。“社会史滥觞之后的各种专史都有所变化,社会史作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接受。”^①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受汉学家费正清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重视社会结构与区域研究。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投身史学研究,对于区域研究贡献重大,影响深远,其论文《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1964)及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7),就是区域研究的名著。在哈佛大学,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1966)探讨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地区各阶层的活动。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80)研究了19世纪中国地方政权普遍军事化的问题。另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重视汉魏研究,1972年出版了中国留美学者瞿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1980年刊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前者宏观探讨社会构成,后者量化研究汉代佃农、自耕农的数量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费用,很有价值。留美的中国学者何柄棣成就卓著,他的论文《扬州盐商:18世纪

^①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1954)、专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1959)、专著《明清社会史论》(1962)影响深远,特别是《明清社会史论》继续美国学者艾博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研究,探讨明清时期科举制给士阶层带来的向上社会流动。许倬云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也进行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张仲礼是研究绅士贡献突出的另一位华裔学者,他的著作《中国绅士》(1955)、《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为此方面研究名著。萧公权的《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1960)研究了里甲、保甲、乡约制度的来源、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两位年轻学者对于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引人注目,即姜士彬的《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1977)与伊沛霞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978),他们采用的个案研究方法是社会史研究领域重要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976)提出的共同体理论,用以解释中国中世纪农民与地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的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了振兴之路。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为突破口的,1983年、1985年分别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这时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资料扎实。如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1985)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1988)、张泽咸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1996)、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1996)、韩大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初探》(1986)、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制度》(1993)等。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之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相继撰文,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进行了讨论,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新时期中国社会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人口社会史、社会习尚和以社会为视角的其他研究方面。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

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出版了一批成果。综合性研究方面，有王子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2006）、侯旭东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2005）、冯尔康的《顾真斋文丛》（2003）与《中国社会史研究》（2010）、王家范的《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2001）、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推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系列，学术质量较高。21世纪以来，生活史更受重视，熊月之主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从2008年陆续推出20多种，内容丰富多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向日常生活史转变的趋势。

事实上，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社会群体方面，士大夫、商人、妇女研究也产生了一批成果，以年龄划分的社会群体儿童、老年的研究有所开展，出现了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93）、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2000）等优秀作品。社会组织方面，家庭史得以开展，家族、宗族是最富成果的领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2005）、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等（2007）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秘密宗教结社与会党的研究多有力作，如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等。会社的研究获得新的进展。历史人口学成为热点，人口流动、人口地理以及人口行为受人关注，郭松义的《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2012）为代表性研究。民俗习尚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也是社会心态的反映，新时期对于历史上风俗、民俗、礼俗的探讨注意到揭示其与民众意识、民间信仰、社会心理的联系性，如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郑振满和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2003）等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婚姻、丧葬、岁时节日的研究较多，重要著作有张邦炜的《宋代婚姻家族史论》（2003），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2000），王跃生的《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2000）与《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2003）等。以社会为视角的其他研究，如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灾害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等引人注目，钱杭的《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2009）、王建革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2009）、张小也的《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2007）、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2003）等是这些方面的代表性研究，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2008)则是综合性研究成果。近期社会文化史颇受关注。

社会史研究强调整体观,但是宏大叙事下的社会史很难把握历史的整体性,整体历史也只能在区域史中落实。社会史研究多采取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现在众多的社会史研究者树立了从地域社会入手的研究理念,认为地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有效途径。地域社会的研究中,地域史的层次性问题已经引起注意。无论是乡村社会史,还是城市社会史,都取得很大成绩。特别受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开展了村落社区的研究,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特色。不同区域的社会史具有系列性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历史·田野丛书”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学术追求,其中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2006)、郑振满的《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2009),反映了这些方面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研究活跃。突出表现在医疗社会史方面,中华书局推出的“生命医疗史系列”(2012)收录了李建民的《从医疗看中国史》、林富士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李贞德的《性别、身体与医疗》、李尚仁的《帝国与现代医学》,此外,梁其姿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2012)属于标志性成果。此外,法制社会史成果也很突出,如柳立言的《宋代的宗教、身份与司法》(2011)。断代史领域都有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如许倬云研究先秦社会,邢义田、蒲慕州研究秦汉社会,毛汉光、陈弱水研究中古社会,萧启庆对元代士人与社会的深入研究,徐泓倡导明清社会风气与城市研究影响较大。宋明时期社会的集体研究,较为突出,宋代家族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如陶晋生的《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2001)、柳立言的《宋代的家庭和法律》(2008)、黄宽重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2009)等。明清则以研究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为特色,熊秉真主持的“近世中国的物质、消费与文化”(2003)计划、王泛森与李孝悌先后主持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2001)、“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2006)计划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清社会史的一批成果值得注意,如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1995)、李孝悌的《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2007)、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等。

欧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标新立异。宋代社会史研究很活跃,罗伯特·海默斯的《政治家与绅士:北宋和南宋时期江西抚州的社会精英》(1986)继续了西方绅士研

究的传统，但是他不以中举与当官作为唯一标准，选出七类人物作为“抚州精英”，引发了何谓“地方精英”的持续性讨论。个案研究则有琳达·沃尔顿的《宋代中国的亲属关系、婚姻和身份：宁波楼氏个案研究》（1985）、戴仁柱的《中国宋朝的宫廷与家族：明州史氏的政治成就与家族命运》（1986）等，关注婚姻、家族、身份及其构成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问题。特别是综合了性别史、身体史、生活史、医疗史乃至科技史的女性史研究引人注目。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收入了伊沛霞、费侠莉、白馥兰、曼素恩、高彦颐、贺萧等学者的优秀著作。

日本学界的中国地域社会研究颇具特色。1981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发表《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基调报告》，倡导地域社会研究，指出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被整合的地域场所称作地域社会。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作者受到了共同体论、乡绅论的启发，吸取了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地域社会研究在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具体的重要成果。如山田贤的《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1994）、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1999）、滨岛敦俊的《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2001）、三木聪的《明清福建农村社会的研究》（2002）等。此外，川胜守的《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2004）也颇值得注意。近来日本的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宋史研究对于社会空间与信息交流感兴趣，不同时期的城市社会史、诉讼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比较鲜明。

本书论著遴选标准

作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应当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学术经典或近乎完美，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显示出突出的原创性和奠基性，同时兼具开放性、超越性与多元性。经典有重要指导作用，传之久远，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人们学习、仿效的标准。

由于社会史领域宽广，内涵丰富，学术界对社会史的理解不一，选出公认的社会史经典无疑是一件难事，对于何谓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自然会见仁见智，标准多歧。我本着对本丛书要求的理解与对社会史经典的把握，结合社会史领域的研究实际情